

如何认识闽粤人的海洋世界：有关闽粤营的思考

洪钰琳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

闽粤，地处中原王朝的边陲之地，在唐宋以前是士人眼中的蛮荒之地、化外之地。然而，正是这片帝国东南的边缘地带，凭海而兴，在宋代以后成为沟通中外的活跃空间。在“南海一号”的古沉船中，我们震撼于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宏大，在泉州开元寺的古沉船中，我们难以想象当时商人交易的盛景。此外，泉州、广州，也是宋元时期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泉州的清净寺、灵山圣墓，广州的怀圣寺、清真先贤古墓等都是闽粤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。

明清时期，官方将海洋与海洋势力视为边界隐患，于是一系列海防措施应运而生，沿海一带设置卫所、水寨、营汛，厉行迁界、禁海等。然而，海洋于民间而言，则是闽粤区域与海外世界联系的通道，是沿海人群向上、向外流动的空间。

如何认识闽粤人的海洋世界？刘志伟老师认为，应该走出海外交通史的视角，去看沿海人群如何利用海洋作为生存发展的空间。滨下武志老师指出，从海的观点来思考陆上新地域关系，以海洋为中心看历史。这些观点与杨国桢老师提出的“海洋本位”的研究思维相应，他强调“海洋史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，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，并从海洋看陆地，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。”

因此，如何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认识闽粤的海洋世界，一直是我在闽粤营中思考的问题。以往，我们对于海洋活动的认知主要基于官方历史文献，而传世文献呈现的是主流社会精英文化接纳的海洋信息，基本上是官员和沿海士大夫的记录。如嘉靖本、光绪本《香山县志》对于海洋信息的描述零星分布于“潮汐”“山川”“食货”“海防”部分。以光绪《香山县志》卷八《海防》为例，其内容主要摘自《天下郡国志》《澳门记略》等文献，此外也附有张甄陶、林则徐等人关于澳门沿海形势的奏折。其中的“论海道深浅行船趋避”部分主要抄自江南制造总局编纂的《海道图说》，它是英国海军海道测量所形成的航海指南。可见，《海防》这一部分的描述是官方海防所需的记录。方志中对海洋的记录是基于官方立场的海洋信息，我们很难看到具体的航海活动。

然而，通过十来天的田野考察，我们看到了官方文献记录之外的生动的闽粤海洋世界，闽粤海上人群的信仰空间、生计模式以及聚落形态等。以香山县考察为例，在鸡山村，我们考察了武侯庙及天后宫、康帅府、玄坛庙，鸡山“三庙”是地方志

没有记载的，三庙的捐款碑呈现了鸡山与周围乡里的活动空间，以及与海外华侨的联系。在淇澳村，我们考察了天后宫、古炮台遗址、白石街、祖庙、钟氏大祠堂以及苏兆征故居，体会地处边陲的淇澳村村民经历迁界、复界，设防筑墙，抗击海盗等历史，听闻村民抗击英军的传说。正是这批普通的海上人群耕海耘波，后来成为近代的海员，组织革命活动，推动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程。唐家三庙的《重修三庙碑》《重修唐家围城碑》《唐家团练公产红呈碑》等 7 块碑，从不同层面呈现了晚清唐家的社会面貌与组织地方团练的经过，以及唐家人的商业网络。同时在捐款者名单中，也记录了美国檀香山及金山华侨的名字，唐家人利用地理优势向外流动，或是伙随贩运，出洋谋生，成为华侨的先行者，早期在夏威夷王国的华工大多是唐家人。或是出洋留学，当时先后被招的唐家籍赴美留学的幼童便有 7 人。今天翠亨村的历史是革命话语主导下的历史，是有关孙中山、杨殷、陆皓东等人的历史。然而通过实地考察翠亨村以及解读祖庙的三块碑，我们重新接触翠亨村历史的另一个面向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家族在成长，一些家族在消失，中间存在变动。也可以感受不同的家族通过海洋实现向上、向外流动，杨家通过充当买办经营猪仔贸易发家致富，孙家则是前往檀香山垦荒起家。

总之，通过实地考察，走访村落、参观祖庙、宗祠、寺庙，解读碑刻等等，我们实实在在地接触、感受到了一部香山人的海洋史，这是官方文献所看不到的海洋史。这也给予我一些启发，认识闽粤人的海洋世界，需要深入现场，需要深入去挖掘民间资料。诚如杨国桢老师所言，海洋史研究要充分发掘海洋历史资源，特别是海内外的沉船文物、海洋活动及海洋移民社会的聚落遗址遗物和民间文物，以提供海洋历史发展延续性的证据。